责编：泓佐 E-mail:ccps6235@163.com Tel:010—62806235

◆战略视角

新理念引领中国新外交

□赵可金

刚刚过去的2013年是国际形势复杂变化的一年，也是中国外交奋发有为的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着眼全局，主动谋划，强调布局，善于谋势，积极运筹与主要大国关系，全力稳定和拓展周边睦邻友好关系，大力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合作，深入参与和引导多边外交进程，在外交布局上更加全面均衡，在外交安排上更加科学高效，在外交运筹上更加务实高效，实现了外交运行理论的一系列理论创新，中国外交呈现出奋发有为的新气象，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

加强顶层设计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从顶层设计角度对中长期对外工作作出战略规划。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观大势、谋大事，科学运筹新局，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思想，明确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总体对外战略，通过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动，将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多边等工作密切结合起来，为运筹中长期外交整体布局奠定了良好基础。

新型大国关系。大国关系是中国外交顶层设计的关键，也是中国和平发展最根本的外部影响因素。一年来，中国坚持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新阶段，中美进入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新时期，中欧合作确定了2020战略规划，中国同发展中大国的协调配合进一步增强，中国大国外交布局更加均衡，合作水平明显提升，正在步入良性互动的健康发展轨道。

2013年3月，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后，首访俄罗斯，签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中俄联合声明》，签署了一大批被称为“世纪合同”的合作协议，中俄元首一年来五次会面，相互合作和国际战略协调保持高位运行，成为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典范。2013年6月，中美元首实现庄园会晤，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明确了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发展内涵，中美元首在2013年实现两次会晤，拜登副总统访华，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第四轮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第24届中美商贸联委会对话成功举行，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正在不断得到充实。此外，2013年11月，第16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成果举办，双方宣布了《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为未来5~10年的中欧合作指明了方向。习近平出席金砖领导人峰会，中国与发展中大国的伙伴关系有了新的提升。可见，构建良性互动、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大国外交的中心，开启了中国大国外交的新方向。

经略周边战略。在科学谋划大国关系的基础上，习近平主席立足中国和平发展大局，将经略周边作为中国战略重心，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就任后首访首站都选择了周边国家，中国同周边21个国家开展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别交往，基本实现了高层交往全覆盖。中央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周边工作座谈会，对周边战略目标、外交方针、总体布局和工作思路进行了科学部署，明确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新理念，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印缅孟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等一系列重大外交倡议，积极推动10+1、10+3、东亚峰会、上海合作组织等各种区域合作机制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为维护地区和平、促进地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引发周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高度关注，安定了四邻，巩固了周边，开创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新局面。

正确义利观。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基础，能否巩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直接决定着中国外交全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后，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足迹踏遍非洲、中亚、东南亚和拉美国家，提出正确义利观，强调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巩固了传统友谊，赢得了真诚伙伴。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坦桑尼亚等非洲三国，会见10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签署了40多个合作文件，宣布了一系列支持非洲发展的新措施，巩固了与非洲国家的传统友谊。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出访拉美三国，签署了24项合作文件，与加勒比地区八国领导人分别举行双边会谈，宣布支持加勒比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新举措，受到各方热烈欢迎。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在出访期间，强调同发展中国家交往中大力弘扬正确义利观，坚持义利并举、义重于利，互利共赢的方针，“要讲感情，讲危难之中见真情”，构建与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共同体”。正确义利观的提出，意味着中国不仅把自己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部分，而且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外交关系时更加进取担当，更强调履行积极有为的国际责任，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经济、政治乃至话语权上的支持。

负责任大国。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上升，中国日益强调承担积极有为的国际责任，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一年来，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参与叙利亚问题、伊朗核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以及阿富汗和平重建等问题的解决，坚定不移地做和平维护者和促进者，为叙利亚问题重回政治解决轨道、六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及管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中国还积极推动达成WTO诞生18年来的首个贸易协定，为这一全球贸易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积极参与制定2015年后发展议程，为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中国领导人积极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年会、G20、东亚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大力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中国与冰岛、瑞士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中韩自由贸易区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等谈判进展顺利。特别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进一步向国际社会传递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信息，得到了国际社会热烈反响。

统筹型外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善于把握大局，科学统筹全局，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加强对外事工作的统筹协调，逐步建立健全了内外兼顾、通盘筹划、统一指挥、统筹实施的统筹协调体系，推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民间、涉外各部门牢固树立“外交一盘棋”理念，保障了中央对对外工作的领导、决策、管理、处置等各项功能顺利实施，保证了中央对外战略意图的实现。2013年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直接领导下，中央加强了有关机制建设，逐步理顺体制机制，制定了明确规定，加强与规范外事和外事管理工作，有力改进和加强了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特别是加强务实外交，围绕群众面临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加大督查落实，提高便民、利民服务效率，加强部际协调机制、央地沟通机制、内外联动机制和官民合作机制建设，与国内外政府机构和企业、媒体、非政府组织等逐步探索建立多方联动的外交服务共同体。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着力从顶层设计角度对中长期对外工作作出战略规划，这是外交科学统筹的一个重要标志。随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中央将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通过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动，将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多边等工作密切结合，综合施策，必将开辟中国外交科学发展的美好未来。

积极策略运筹

政策和策略是党和政府的生命。要想将顶层设计的国家纲领和战略规划贯彻落实，离不开在对外政策的具体执行环节顺势而为，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变化，及时制定正确的政策与策略。2013年，中央统筹内政外交战略全局，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着眼于维护和巩固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局，加强策略运筹，主动布局，精准发力，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新实践，实现了中国外交的新突破。

增强战略定力。作为经济体量居世界第二的庞大经济体，克服内外压力最关键的是稳定国内外的信心，增强战略定力。十八大以来，中国明确了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思想，成为统率中国战略全局的核心。2013年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战略思维，增强战略定力，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作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

中国增强战略定力，主要体现在坚持改革开放和稳定宏观经济政策上。在2013年年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方针，全力维护中国和平发展的势头。2013年9月1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3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的致辞中强调，中国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着力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表明中国已经具备大国自信，选择了一条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转型升级之路。在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制度改革上来，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有这一切均表明，中国外交越来越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咬定青山不放松，中国外交正以更为宽广的视野、更富进取的姿态在全球范围内稳步展开。

注重科学运筹。中国有170多个建交国家，参与了绝大多数国际组织，如果不能有效运筹有限的外交资源，是不能达到日益上升的外交需求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外交方式上进行了科学运筹，在双边外交中拓展多边外交舞台，在多边外交中强化双边外交，实现了外交效果的务实高效。

从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出访行程安排来看，十分重视在双边外交中拓展多边外交舞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非德班访问期间，同非洲国家领导人举行早餐会，在访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期间与拉美11国领导人举行午餐会。李克强访问罗马尼亚期间，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开展了很好的对话和交流。此种在双边外交中构建多边外交舞台，大大节省了外交资源，拓展了中国多边外交的舞台，取得了很好的外交效果。

同时，中国领导人也十分重视利用多边外交舞台开展双边外交，增强多边外交的影响力。习近平在出席G20峰会前后，安排对一些重要国家进行访问，提前就一些重大问题释放声音，引发各方面的关注，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举行双边会晤，交流一些治国理政的经验，为多边外交提供中国方案。李克强总理在出席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前后，也开展对一些国家的访问，提出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外交倡议，并在峰会期间与多国领导人开展双边会晤，交流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深化双边协调和务实合作，效果突出。

此外，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在重大外交活动中创新外交方式，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亲和力。比如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开展的庄园外交，受到世界关注，对增进中美理解和扩大共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巴厘岛APEC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为普京总统送上生日礼物，开展“蛋糕外交”，以及彭丽媛作为主席夫人开展“第一夫人”外交，为首脑外交锦上添花。所有这些外交创新，符合外交科学规律，取得了超出预期的良好效果，开创了中国外交新局面。

抓住主要矛盾。策略运筹并非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要善于抓主要矛盾，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2013年的中国外交，从中国改革发展的大局出发，直面矛盾和挑战，在外交事务上更加进取担当，尤其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主动发声，下先手棋，在较短的时间内扭转了此前一度被动的外交态势，赢得了中国外交的良好开局。

面对中国周边环境“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复杂局面，中央领导频频出访，采取“先外围后周边”的思路，努力寻求缓和周边外交局势的对策。习近平总书记当选国家主席后，首访俄罗斯，与普京总统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中俄关系作为中国外交优先发展的方向，保持了高位运行，稳定了周边外交的半壁江山。随后，李克强总理首访印度，提出一系列重大倡议，得到印度积极回应。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2013年下半年访问中亚和东南亚国家，出席一系列东亚领导人峰会，提出了许多受到高度关注的外交倡议，中国周边局势得以稳定。特别是在缓和朝鲜半岛局势、管控钓鱼岛争端、推动南中国海合作方面，中国领导人果断决策，夯实了中国周边战略的稳定基石。在此基础上，中央召开首次周边工作会议，对经略周边提出全面部署，巩固了外交胜利果实。

坚持底线思维

一个国家越具有国际影响力，面对各种明枪暗箭式的战略考验越大，越要求其外交具有底线思维。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既要争取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又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利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一年来，在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中国外交坚守底线，敢于和善于捍卫国家利益，牢牢把控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局。

坚守原则底线。大国必须是一个有原则的国家，而且在原则问题强调信誉，言必信，行必果，这样才能有大国担当。一年来，中国在钓鱼岛主权、东海防卫识别区、南中国海争端等事关原则问题上坚定不移，不仅自己要坚守原则底线，而且还要重视履约践诺的底线，如果其他国家挑战中国坚持的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原则，中国则敢于动用全部资源施加反制。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中国外交坚持原则，不回避矛盾，主动发生，主动布局，赢得了有利于我国的外交态势。在划设东海防卫识别区问题上，中国坚持原则，主动施策，精巧发力，顶住各种压力，维护了我国正当权益。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上，中国坚持原则，掌握尺度，你进一步，我进一步，绝不吃亏，也不升级，实现了“打破实控未失控”。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牢牢把握维持地区和平稳定大局，积极致力于互利共赢，推动外交谈判顺利进行，反映出日臻娴熟的外交技巧。对于一些国家的政治家不负责任的政治言行和外交表态，中国也坚持原则，敢于批评，并采取适当举措，在不升级的前提下，开展必要的外交斗争。即便中国卷入周边国家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也必须恪守在内政问题上的国际关系原则，不能逾越外交政策底线。

树立大国心态。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作为一个综合国力快速上升和社会模式与众不同的大国，受到来自各方的怀疑、批评乃至打压都是不可避免的。面对这些批评和打压，中国不怕批评，不怕打压，甚至面对打压，从容应对，妥善处理，呈现出大国必备的心态。

中国领导人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积极引导舆论，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出访时，要么主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要么在外国媒体发表署名文章，主动向世界介绍出访的目的和中国的政策主张，不回避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表现出自信从容的大国心态。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选派专家学者和相关官员，应邀到各国介绍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其政策变化，主动解释中国的政策，回应外国的关切，正在走向良性互动。

同时，培养大国心态，关键是振奋民族精神。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强调弘扬民族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大力加强爱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2013年的公共外交强调奋发有为，孔子学院、友好城市、对外传播等有了迅猛的发展。中国已与世界上131个国家，建立了2022对友好城市市洲，关系友好城市已成为中外地方政府和城市在各个领域交流的主要渠道。孔子学院和课堂的布点已经覆盖了占世界人口88%的国家，有120个国家建立了440所孔子学院和648个中小学孔子课堂。目前还有400所国外大学在排队申办，等待审批。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主流媒体为代表，实施传播走出去工程，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网络，主动设置议题，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影响力日益上升。文化部大力开展对外文化工作，欢乐春节等品牌活动影响力不断加大。国侨办侨务公共外交也发展迅猛，美国华侨反对ABC主播的抗议活动影响力受到重视。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大力实施服务企业走出去工程，多次召开研讨会，推动外交资源和企业资源的统筹利用。此外，在热点问题上，中国主动设置议题，开展危机公共外交，效果良好。

做好两手准备。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既有向好的方向争取和发展的可能，也有恶化乃至失控的危险。一年来，中国坚定贯彻中央决策部署，有力遏制了个别国家侵犯我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同时，中国主张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和谈判寻找妥善解决办法。中方同东盟国家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框架下启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同文莱、越南就推进共同开发与海上合作达成一致，维护了南海的和平稳定。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就必须做好两手准备，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

在遇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中国既要不急不躁，积极创造条件，争取事情向积极的一面转化，通过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促成问题得到解决。与此同时，中国也要做好最坏的准备，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比如在南海问题上，相比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其他问题都是小问题。只要不改变现状，不挑战原先达成的原则和共识，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谈判解决。一些国家暂时有困难，中国也可以伸以援手，共克时艰。但如果非得要以此挑战底线，进而引发冲突和更严重的后果，中国也不怕，要做好最坏情况的打算，特别是军事斗争的准备。总之，和平欢迎，战争也不怕，唯有坚持原则，进退有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南海问题。在南海问题上是如此，在其他问题上亦是如此。

做好两手准备，并不意味着立即启动相关预案和计划，而是实现有备无患。坚持底线思维，意味着在处理外交事务时要改变以往“防守反击”的消极思维，贯彻主动规划、主动部署和主动调整的积极思维，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要做好各种预案，甚至进行模拟演练，充分考虑到各种可能情况的发生。因此，对新时期的中国外交来说，既要有立足于和平发展的各种计划和办法，也要有处理最危险情况的准备，这样才能有备无患，也才能维护和巩固中国和平发展的势头，为中国长期和平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热点透析

不要用正常思维看日本右翼

□张仕荣

2013年12月26日上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前往靖国神社进行了参拜。26日下午，外交部长王毅召见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代表中国政府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28日，国务委员杨洁篪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发表谈话指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前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参拜了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是对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各国人民感情的肆意伤害，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公然挑衅，是对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粗暴践踏，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的狂妄挑战。

事实上，日本右翼势力多年来已经沉渣泛起，肆意破坏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必须看清日本右翼势力背后的思想溯源、历史背景与现实诉求，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战略预案，做好应对准备。

首先，日本右翼势力是日本武士道精神指引下日本军国主义在新时期的复活。军国主义从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形成并发展，其思想渊源为古代的日本武士道精神。20世纪初，尽管科技日渐发达，日本统治者仍旧以类似中世纪的封建统治思想教化国民，宣扬天皇是神的化身。二战前，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也是极力鼓吹所谓“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日本军人被告知，他们在战场上为国家、为天皇而死恰如樱花坠地，战死者便已成神。2013年5月中旬，安倍对美国《外交》杂志表示，靖国神社类似美国的阿灵顿国家公墓，故前往参拜也无妨。对此，《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安倍的言论完全是自欺欺人，靖国神社与阿灵顿公墓的性质根本不同。靖国神社不是墓地而是战争期间日本皇军的灵堂，宣扬“国家神道”，是军国主义战争的精神支柱。安倍等屡次表达要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愿望”，但遗憾的是，事实表明，他们的诉求，根本不是从“战败国家”到“普通国家”的正常诉求。安倍政府的种种“不正常”表现，是对军国主义复活别有用心的怂恿，极大挑战了战后国际秩序，也大大加重了日本政治的“不正常”趋势。

其次，日本右翼势力在历史上宣扬侵略战争“正义论”，对外多次疯狂扩张，踏上侵略亚洲各国的道路，同时也将日本民族引向灾难。1945年10月24日生效的《联合国宪章》指出，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国”，第107条指出，“本宪章并不取消或禁止负行动责任之政府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国因该次战争而采取或受权执行之行动。”所以，在此约束下的日本战后一直以战败国的身份跻身国际社会。尽管如此，日本却始终未对其历史罪行进行实质性反思，也并未如同德国那样向全世界进行彻底的忏悔。

目前的日本政界对外政策的右倾化和冒险性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其根源在于二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清算不力，甚至使战犯岸信介等人重新进入政治舞台，这在战后的德国是不敢想象的。近年来有人提出“中日不再战”，这种论调完全混淆了战争的责任问题，抹煞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义性，把战争责任分摊给中日两国。

再次，日本右翼势力的活跃还与日本国民的现实挫败感紧密相连。在东亚地区秩序中，1945年前日本一直是主导东亚地区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因素。由于在世界近现代史的一百多年间，包括20世纪的后20年，日本一直领先中国，现在面对一衣带水的邻国迅速崛起，日本政府和国民在心态上无法接受。日本经济多年来一直低迷，国家债务沉重，社会就业欠佳。1990年至今，日本先后产生了16位首相，堪称一年一相，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国际政治和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息息相关，探究其深层原因在于日本社会面对政治转型和经济低迷的困惑期表现出来的政策、舆论和民意的摇摆不定。

历史表明，一个民族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在政治家们的误导下会走入歧途。二战以前的德国和日本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也是爱好和平的。但是，在军国主义势力的蛊惑、欺骗之下，善良的人民却把政权交给了军国主义分子，任由他们对内搞专制暴政，对外侵略扩张，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因此，不要用正常思维看日本右翼势力，要让美国和世界认识日本右翼势力的极端非理性特点，要做最坏准备，特别是做好战略预案，预防其突然行动，孤注一掷，铤而走险。

当今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中国必须耐心对待日本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演变，低潮时期并非全面改善中日关系的良机。同时对待中日关系切忌情绪化和“民粹”化，正视日本侵华历史和日本右翼的冒险性，但是不可以片面地掀起对日本整个民族和国家的狭隘的仇恨感，要将日本右翼与日本全体国民进行理性的区分，认真地研究日本，做好中日关系的大文章。戴季陶曾经讲过：“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不知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功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思想上的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